

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 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

郝培芝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亞歐會議乃是歐盟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對於東亞主要國家所建立之最高層級的區域間對話機制。事實上，亞歐會議形成的推動者除了歐盟以外，最主要的行動者乃是東協國家，而既有相關文獻較缺乏此一面向的分析。本文認為東協與歐盟這兩個區域組織推動亞歐會議有其結構性因素，本文試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藉由新區域主義的三項主要特質：外向型與開放性區域主義，南/北區域主義以及複合型區域主義，來分析東協與歐盟推動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並試圖論證亞歐會議乃是東協與歐盟兩者為回應全球化與區域化挑戰的一種方式。

關鍵詞：亞歐會議、新區域主義、歐洲聯盟、東協

* * *

壹、前 言

歐洲議會曾於二〇〇二年四月以及九月陸續兩次通過攸關兩岸問題的報告決議，其中除了發表相當友台的政策宣言外，^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次歐洲議會的決議都公開建議台灣應該加入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或稱亞歐會議）。

註① 歐洲議會於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一日通過歐盟執委會提出的「歐盟對中國策略」報告決議案，強調歐洲議會不能接受中共保留對台使用武力之可能性，主張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須尊重並顧及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意願與同意。同年九月歐洲議會又再以壓倒性票數通過促請中國撤除在台海沿岸部署飛彈之決議案，而通過這兩次決議案的同時，歐洲議會也兩度呼籲歐盟邀請台灣參與二〇〇二年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第四屆亞歐會議。參見：自由時報，民國91年4月12日，版2，以及中國時報，民國91年9月25日，版2。歐洲議會於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通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年度報告決議文，再度以強烈字眼要求中國撤除對台的飛彈武力威脅，參見：自由時報，民國92年10月24日，版2。

亞歐會議自一九九六年成立以來，較少受到國內的注意，但是事實上，亞歐會議乃是目前亞/歐兩大區域間唯一最高層級的區域間對話機制，也是歐盟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相應於一九九四年所通過的新東亞政策^②所建構之對於東亞地區的新政策平台，同時這幾年歐盟越來越加重亞歐會議作為其整體東亞政策機制的重要性，因此，台灣應該重視其相關發展。

對於亞歐會議的分析，既有相關文獻強調亞歐會議乃是歐盟作為抗衡亞太經合會（APEC），^③或是歐盟為提升與東亞經濟關係，^④或是歐盟為延續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以下簡稱東協）既有的雙邊關係，^⑤本文認為這些都是理解亞歐會議形成相當重要的面向，但是這些相關分析較偏重於歐盟推動亞歐會議的動力分析，然而事實上，推動亞歐會議形成的行動者除了歐盟之外，最主要乃是東協國家，而以上既有的相關文獻分析，似乎較未凸顯此一關鍵事實，也並未針對此一關鍵現象提出相關的解釋與分析。另外，本文也認為作為一開發中國家區域組織的東協，以及已開發國家區域組織的歐盟，這兩個區域組織積極推動亞歐會議有其結構性因素。本文嘗試從全球化與區域化過程中，區域組織如何回應全球化挑戰的思考脈絡，來理解亞歐會議的產生，在既有文獻的基礎上，本文擬從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的觀點分析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及其意義，並試圖論證亞歐會議的成立，乃為東協以及歐盟為面對全球化與區域化挑戰所作回應方式的一部份。

本文第一部份將概述亞歐會議的緣起、組織架構與發展過程；第二部份將從全球

註② “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 (1994) 427 final.

註③ David Camroux 和 Christian Lechervy 以及 Victor Pou Serradell 皆認為亞歐會議乃是歐洲與亞洲國家作為平衡亞太經合會的機制。David Camroux 以及 Christian Lechervy 兩位學者更進一步說明，事實上，關於亞歐會議作為平衡亞太經合會這一點，亞歐雙方卻有著不同的考量點。對於歐洲國家而言，主要是面對美國在國際政治經貿事務上所呈現出的單邊主義，歐洲希望透過與東亞國家合組亞歐會議，間接釋放給美國一個訊息，提醒美國，亞歐雙方將會透過亞歐會議來抗衡美國的單邊主義。而在亞洲部份，主要是部份亞洲國家（特別是馬來西亞與中國）擔憂美國過度主導亞太經合會的發展，因此一方面希望增加他們在亞太經合會中的主導權，另一方面則希望透過與歐洲國家組成亞歐會議來抗衡美國在亞太經合會中的影響力。參見：David Camroux and Christian Lechervy, “Close Encounter of a Third Kind? The Inaugural Asia-Europe Meeting of March 1996,” *The Pacific Review*, Vol. 9, No. 3, (1996), pp. 442-453. 以及 Victor Pou Serradell,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2 (1996), pp. 185~210.

註④ Christopher M. Dent 主要是著重於經濟面向的分析，從北美/歐盟/東亞三角圍塊關係的脈絡中，說明歐洲聯盟擔憂在亞太地區快速的整合過程中，歐盟與東亞的經濟關係將會邊緣化，因此希望亞歐會議作為提升與東亞經濟關係的重要機制，參見：Christopher M. Dent, “The ASEM: Managing the New Framework of the EU’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4 (Winter, 1997-1998), pp. 495~516.

註⑤ Joseph A. McMahon, “ASEAN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 Strengthening the European Union’s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3 (1998), pp. 233~251. 以及 Victor Pou Serradell, *op. cit.*

化與區域化的發展脈絡，論及新區域主義的三項主要特質：外向型與開放型區域主義，南/北區域主義以及複合型區域主義，藉以作為分析東協與歐盟推動亞歐會議形成的理論分析基礎；第三部份將從新區域主義的內涵，分析東協作為一開發中國家的區域組織，積極推動亞歐會議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第四部份則分析歐盟自一九九〇年代起，在新區域主義策略下所展現出的區域間主義（inter-regionalism）之發展策略，以及亞歐會議作為一亞/歐區域間組織對於歐盟所具有之意義；最後則為結論。

貳、亞歐會議的緣起與發展

對於亞歐會議的形成與推動，東協國家（尤其是新加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亞歐會議的構想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商業會議中首次被提出，並獲得參與成員的同意。^⑥隨後，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利用於一九九四年十月至歐洲主要國家進行訪問時，積極地推動亞歐會議的形成與具體化。吳作棟總理在法國進行官方訪問，與當時的法國總理巴拉度（Edouard Balladur）會面時，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亞洲與歐洲之間應該建立一最高層級之對話機制的想法。^⑦而事實上，在更早同年四月訪問德國與英國時，新加坡政府就已經向歐洲主要國家表達這種想法，歐洲主要幾個國家，如德國、英國、法國都展現出對於亞洲高度興趣的態度，更鼓舞了新加坡推動亞歐會議的信心。^⑧

對於亞歐會議的想法，吳作棟總理曾公開表示認為，亞洲應該與歐洲建立一個類似太平洋式，也就是類似亞太經合會的最高層次對話機制。新加坡總理表示，相對於歐/美、亞/美之間皆已經建立相當制度化的區域間關係，歐洲與亞洲長期以來卻缺乏類似的制度性區域間機制，亞歐會議的目的即是要補足歐/亞之間長期以來所短缺的連結關係。^⑨

亞歐會議設定為每兩年舉行一次國家或政府領導人層級的高峰會議，由歐洲國家以及亞洲國家輪流舉辦。參與成員國包括歐洲聯盟成員國十五國以及歐盟主席，亞洲部份則是東協主要七國，加上中國、日本、韓國。第一次亞歐會議於一九九六年在泰

註⑥ 一九九四年由世界經濟論壇在新加坡所召開的歐洲/東亞經濟會議中，在會議結論部份提出「行動方案」中曾提及：「在既有的歐洲與東亞合作機制外，需要建立一更廣泛以政府領導人為基礎的合作機制」。而亞歐會議也同樣是一九九五年在新加坡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中主要的議題之一。

註⑦ Victor Pou Serradell, *op. cit.*, pp. 185~186.

註⑧ 英法兩國由於過去在亞洲的殖民歷史經驗，一向對於亞洲事務展現高度興趣。德國自從一九九〇年代初也展現對於亞洲事務的高度興趣，認為應該積極發展新的亞洲政策，而在一九九三年德國總理柯爾所發表的「聯邦德國對於亞洲的概念」文件中，認為德國（乃至於整個歐洲）應該正視亞洲經濟力量，不應將亞洲視為威脅，而應尋求各種可能的機會，擴展過去未積極開發的潛在利益。參閱“The Federal Government’s Concept of Asia,”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Federal Foreign Office, Bonn, 1994.

註⑨ Goh Chok Tong, “L’Asie et l’Europe : une nouvelle alliance pour le XXI^e siècle,” *Politique Etrangère* (Hiver 1994/1995), pp. 1099~1106.

國曼谷舉行，會中確立了亞歐會議的基本架構，相關組織與主要議題，主軸在於討論貿易自由化相關議題，同時確立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第二次會議於一九九八年於英國倫敦舉行，此次會議因適逢一九九七年亞洲經濟危機，會議主軸在於討論經濟危機相關議題。第三次會議於二〇〇〇年在韓國漢城舉行，主要針對三大方面議題（經濟、政治、文化）進行更深入的合作討論，同時兩韓問題也成為該次會議討論的重心。第四次會議在二〇〇二年九月於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主要針對九一一事件，與會各國探討反恐議題，會後並發表了「反恐合作宣言」（The ASEM Copenhagen Declaration on Cooperation agains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⑩關於歷屆亞歐會議主要議題與相關重要宣言，請參見表一。

表一 歷屆亞歐會議主要議題與相關宣言

	背景與主軸	主要議題與成果	主要宣言內容與意義
第一次曼谷會議（1996）	對於亞洲經濟發展的高度期許	設定亞歐會議主要組織架構與基本原則。 討論貿易自由化相關議題。	大會宣言： 確立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
第二次倫敦會議（1998）	亞洲金融危機	設定「提升貿易與投資行動方案」（TEAP, IPAP）以提升亞歐雙邊經貿投資關係。 成立信託基金協助解決亞洲金融危機。	關於亞洲金融經濟情勢報告： 重中國際貨幣組織對於解決亞洲經濟危機的主導地位，以及國際金融組織所提相關改革方案之重要性。
第三次漢城會議（2000）	兩韓領導人進行歷史性會面	討論朝鮮半島新的發展情勢，強調將北韓整合進國際體系之重要性。 建立亞歐合作架構（AECF）。	朝鮮半島問題漢城宣言： 強調朝鮮半島能源組織（KEDO）對於解決北韓問題的重要性，鼓勵亞歐會議成員國積極與北韓互動。
第四次哥本哈根會議（2002）	九一一事件後，商討反恐議題	確立哥本哈根亞歐反恐合作計劃。 成立特別任務小組設定亞歐經濟合作議題：如世貿組織談判議程，歐元角色等議題。	哥本哈根反恐宣言： 強調反恐活動必須遵照聯合國憲章原則，武力介入並非唯一解決方式。 朝鮮半島和平政治宣言： 呼籲美國與北韓恢復對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組織架構方面，除了每兩年舉行一次國家領導人層級的高峰會議外，主要設定了經濟、政治、文化三面向的組織架構。發展至目前為止，在經濟方面的相關組織建立最為完整。在經濟議題方面，除了每年舉行財政部長以及經濟部長會議外，尚設有年度亞歐商業論壇，以及不定期的部長層級會議、高級官員會議、商務會議、專家會

註⑩ 請參閱：<<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relations/asem/asem-summits/asem4/2.htm>>。

議等相關組織，討論攸關貿易自由化、促進雙邊貿易等相關議題與合作。和 APEC 有所不同，亞歐會議尚設有政治議題的討論，除了舉行年度的外交部長會議之外，在大會中也針對各項安全議題廣泛交換意見。在文化方面，主要是透過亞歐基金會，提升雙方的文化交流。亞歐會議自我界定其組織具有以下三項特質：非正式性（對話而非協商），多面性（包含政治、經濟、文化多面向議題），以及高階層性（以國家或政府領導人為主的高峰會議）。^①

叁、新區域主義：全球化之下區域組織的回應方式

自一九八〇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球開始興起新一波的區域主義發展潮流，儘管學界對於這一波新的區域整合發展，有著不同的著重點以及分析角度，但是一般皆同意這一波區域主義發展主要是來自於全球化的壓力。在全球化的挑戰下，傳統國家層次不足以回應全球化的挑戰，透過區域單位可以降低全球化的風險，因此區域化可以作為國家層次面對全球化的一種回應方式。^②而這一波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的發展現象，迥異於一九三〇年代抑或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區域主義的發展特質，其具有以下三項內涵與特質：

一、外向型與開放型區域主義 (extroverted and open regionalism)

一九九〇年代的新區域主義最主要的特色之一，特別是相對於過去的內向型，保護性質的區域主義發展，新區域主義則展現其外向性與開放性。^③過去傳統的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or arrangement, RTA），目的是為增進區域間的貿易量或是進行產業間的區域整合，成立的背景往往產生於全球經貿體系產生危機時，

註① 請參見：Commission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Perspectives et priorités du processus ASEM (réunion Asie-Europe) pour les dix années à venir," *Document de Travail de la Commission*, Bruxelles, le 18 April, 2000, COM(2000) 241 final, p. 6.

註② 關於新區域主義形成的原因，相關文獻有的著重於區域內部因素的分析，如個別國家希望增加集體談判力量，小國希望在區域性架構中平衡區域強權勢力，商業團體的利益考量，第三世界國家希望增加全球競爭力等；大部分的文獻則強調系統性因素，認為區域化乃是國家回應全球化的一種方式，以致國家經濟發展必須與地緣因素結合，同時全球化自由貿易的談判過程與結果也會加速區域化的發展，而不同類型國家面對全球化也有不同的發展策略。參見：Bjö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 210~224; Mario Telo, "Introduction: Globalization,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Mario Telo, ed.,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 (Aldershot, U. K.: Ashgate, 2001), pp. 4~8; Frédérique Sachwald, "La mondialisation comme facteur d'intégration régionale," *Politique Etrangère*, No. 2 (1997), pp. 257~337.

註③ 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Hettne, Inotai, and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p. 7~8.

各區域為尋求自保，避免過度依賴國際經貿體系，因而發展出一種內向性、保護性的區域主義。相對於過去舊的區域主義的發展，九〇年代的新區域主義產生背景則為全球化，由於全球化下國際經貿互依性增強，各國一方面必須透過區域整合方式作為建構全球經貿策略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必須建立對外開放性的連結關係，以求積極整合進入國際體系，導致產生一種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核心價值，以簽訂區域內或區域間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為主要型態的外向型區域主義，學者 James H. Mittelman 將其界定為一種「新自由主義的區域主義」（neoliberal regionalism）。^⑭

關於這種外向型區域主義特質，相關研究學者 J. de Melo 與 A. Panagariya 也特別強調新區域主義的最主要特色之一，即是其區域整合的範圍相當廣泛，有時甚至涵括好幾個區域範圍，同時為建立更大的對外連結關係，往往會建立全球性的網絡關係。^⑮而依據這種外向型區域主義的內涵，也反應了幾個現象：第一，區域成為一中介單位，為個別國家對外的集體行動單位，透過區域單位，個別國家可以增加其集體談判力量；第二，區域組織必須積極建立對外的連結，尤其特別是著重於建立跨區域間的關係。我們可以見到，自八〇年代末起，不僅是全球各區域性區域組織紛紛成立，同時各區域組織之間，也密切地建立各種區域間關係，特別是簽訂許多區域間自由貿易協定或是建立區域間的對話機制。因此，外向型區域主義主要強調相對於過去內向型區域主義的差異，特別是凸顯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各國所做的一種國際經貿戰略的改變，導致各區域積極建立跨區域的對外連結關係，以及方興未艾的各區域內與區域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趨勢。因此即使是被界定為封閉型區域主義的歐盟，也必須積極對外建立連結關係。

另外，開放型區域主義^⑯通常是解釋亞太區域整合的重要特質，其特色在於說明對內形成自由貿易區的同時，對外也積極提昇全球的貿易自由化進程，形成一種對區域外成員國開放而不封閉的對外關係。^⑰事實上，此一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不僅被許

註⑭ James H. Mittelman, "Rethinking the New Regio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bid.*, p. 27.

註⑮ J. de Melo and A. Panagariya, "The New Regionalism,"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29, No. 4 (1992), p. 37; 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91), p. 2.

註⑯ Peter Drysdale, "Open Regionalism: A Key to East Asia's Economic Future," *Pacific Economic Paper*, No. 197,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July 1991; Peter Drysdale and Ross Garnaut, "The Pacific: An Application of a General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 Fred Bergsten and Marcus Noland, eds., *Pacific Dynam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Secretariat an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83~223.

註⑰ 開放性區域主義之所以稱為開放，是因為其市場開放成果不僅嘉惠會員國，而且延伸非會員國，另一方面，在開放型區域主義中，不僅結果開放，達成市場開放之過程方法也開放給會員國自行決定。參見：Second Report of the Eminent Persons Group, *Achieving the APEC Vision, Free and Open Trade in the Asia Pacific* (APEC, August 1994), pp. 29~35.

多開發中國家的區域組織，如東協以及南錐共同體（MERCOSUR）等所接受作為其區域組織的重要原則，^⑧也被目前主要的區域間組織，如亞太經合會以及亞歐會議列為最重要的組織原則。而開發中國家主要是希望透過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積極整合進入國際體系，一方面避免走向封閉式區域主義，另一方面則是作為與已開發國家區域組織整合的重要機制。例如，南錐共同體與歐洲聯盟在一九九四年的雙邊聯合宣言中，即明白將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作為雙邊區域間關係的主軸。^⑨

二、南/北區域主義（North-South regionalism）

全球化最重要的一項特徵，也是與過去國際化最大的差異，即是國際資本的快速增加與全球化，以及國際資本大量移往開發中國家的現象，本文認為必須透過此一關鍵點的觀察，才能理解新舊區域主義的主要差異，以及其所衍生的南/北關係之變化。^⑩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明顯地觀察到，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國際資本大量移往開發中國家的現象。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三年之間，投注在開發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量增加了將近四倍，開發中國家佔全球直接外來投資量，從一九八九年的 18 % 增加到一九九三年的 44 %。^⑪這種在南/北國家之間大量增加的資本投資現象，也導致資本輸出國與資本接受國之間關係的變化，促使雙方必須建立制度化機制來管理國際資本的繼續流通。

因此，新區域主義強調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區域貿易協定，而非過去的開發中國家彼此之間的協定。對於資本輸出國而言，是希望建立制度性機制，透過談判投資多邊協定，以利有效管理資本，降低國際投資的風險，並保障國際商業活動的安全性。而開發中國家也希望在全球資本競爭中，透過積極與已開發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提供跨國性、多國性的保障條件來增加自身的競爭力，以爭取國際資金的進駐。^⑫如同 J. de Melo 與 A. Panagariya 所認為的：「開發中國家現在寧願尋求與已開發國家作為合作夥伴，而非開發中國家彼此之間作為合作夥伴，這是一件相當大的轉變」。^⑬學者 J. Park 也提出相同的觀察，認為「新區域主義發展最重要的特色即是南/北國家之間進行區域協定，而非如第一波區域主義所展現出的南/南國家之間的區域協定」。^⑭

註⑧ Claudia Sanchez Baj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ercosur: a Case of Inter-Region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1999), pp. 927~941.

註⑨ *Ibid.*, p. 939.

註⑩ Richard Higgott, "Mondialisation et gouvernance: l'émergence du niveau régional," *Politique Etrangère*, No.4 (hiver 1996/1997), 279~292; Sachwald, *op. cit.*

註⑪ United Nations Center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UNCTC),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5), p. 16.

註⑫ Paul Bowles, "ASEAN, 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2 (Summer 1997), pp. 228~229.

註⑬ Melo and Panagariya, *op. cit.*, p. 37.

註⑭ J. Park, "The New Regionalism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Vol. 11, No. 1 (1995), p. 23.

同時，南/北區域主義也呈現出另一項重要特質，亦即過去傳統認為區域經濟整合協定最好是結合經濟發展條件相近的國家，特別是國民生產毛額接近的國家，比較有利於區域主義的發展，然而新區域主義卻往往是以結合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貿易協定為特色，甚至是國民所得差異甚大的國家們彼此進行整合。例如在東協國家中，新加坡的國民所得幾乎是印尼的二十五倍之多，在北美自由貿易區中，美國國民所得約是墨西哥的七倍。^⑤另外，依循同樣的邏輯，當前許多已開發國家的區域組織（如亞太經合會、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歐盟）也都必須積極與開發中國家或其區域組織（如中南美洲國家、土耳其、墨西哥、波羅地海國家，及南錐共同體等）進行區域間的貿易投資協定，這也是南/北區域主義相當重要的特質之一。

三、複合型區域主義 (multiple regionalism)

在新區域主義下，一國通常不只是參與一個區域組織，通常是參與好幾個區域組織，呈現出成員國在參與區域組織的多元重疊性。例如東協不僅組成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以及東協區域論壇（ARF），也是亞太經合會、東亞經濟論壇（EAEC）成員，現今又是亞歐會議的成員，積極與歐盟互動。如同J. Whalley所強調的：「儘管存在著多邊自由貿易的原則，但是現今GATT/WTO的成員國至少也都參與一個以上的區域組織」。^⑥

這種複合型區域主義反應出在全球化過程中，國際資本投資的全球化以及不確定性，各國希望透過建立多方的貿易協定來分散風險，以及各國希望積極整合進入世界經濟發展體系的願望。同時為了因應世界貿易組織所提倡的自由化進程，各區域也必須加強與各區域之間自由貿易協定來提前適應全球化的進程，加深複合型區域主義的產生。

另外，複合型區域主義的形成也與後冷戰多元體系有關，有別於冷戰時期的霸權型區域主義（hegemonic regionalism），^⑦在後冷戰下的新一波區域主義形成的動力，往往源自區域的內在自發力，同時兼具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目的，因此各國會依循不同的政治經濟目的，多元參與或籌組區域組織，因此建構出多重、複雜甚至複合重疊的現象，也促使複合型區域主義的形成，並導致新區域主義下的區域組織之發展，不只限於單純的政治性安全同盟或是經濟性關稅同盟，而往往發展為兼具政治、經濟、文化多重目的之全面性區域組織。

註⑤ 其它例子（以一九九七年資料為例）尚包括：在亞太經合會中，日本國民所得約是中國的二十倍，在歐洲聯盟部份，德國與希臘國民所得相差二倍。參閱：RAMSES, 1997 (Paris, Ifri), pp. 145~146.

註⑥ J. Whalley, "Why Do Countries Seek Regional Trading Agreem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5552, 1996, p. 7. Cited from Paul Bowles, *op. cit.*, p. 226.

註⑦ Björn Hettne, "The New Regionalism: A Prologue," in Hettne, Inotai, and Sunkel, eds., p. xvii.

肆、東協推動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 開發中國家區域組織回應全球化方式

從以上新區域主義的內涵而言，有助於我們分析東協與歐盟推動亞歐會議的動力形成。對於東協而言，從新區域主義的分析脈絡，特別是從南/北區域主義觀點可以理解東協對於亞歐會議的政策思考，這反應了在全球化過程中，開發中國家面對全球化的一種回應方式。從南/北區域主義的觀點而言，開發中國家回應全球化之挑戰方式，除了積極整合進入國際體系之外，最重要的是增加自身的競爭力，以爭取國際資本的進駐。東協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發展策略主要是以吸收外資進行出口導向，國際資金對其經濟發展有著絕對關鍵的角色，儘管東南亞地區在八〇年代乃是所有開發中國家之中，吸引最多外國直接投資的地區，但是在後冷戰時期，其必須面臨來自於中國、前蘇聯國家、中東歐國家等新興開發中國家的競爭，促使東協必須採取更積極的作為來繼續爭取國際資金的進駐。

這種擔憂國際資金分散的策略思考，事實上也成為東協國家在一九九二年快速地通過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提議的主要動力。^{②⑧}基本上，東協區域內的貿易量向來僅佔其全部的百分之二十左右，^{②⑨}因此東協成立自由貿易區的主要目的，並非是要擴展東協區域內的貿易量，而是要爭取國際資金。儘管東協的資金主要來自東亞地區，具有相當區域性，但是為爭取國際資金，其必須積極與其它區域互動，特別是必須與已開發國家區域組織互動，才能在這一波開發中國家爭取國際資金的競賽中增加其有利因素。關於這一點，在一九九五年東協會議中，也特別明確點出，東協必須擴大與其它區域組織的關係，特別是必須與歐洲聯盟，紐澳區域組織（CER），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已開發國家區域組織積極互動。^{③①}

此外，特別在九〇年代中期一些國際結構情勢的發展，對於東協而言，這種擔憂國際資金分散的壓力更為急迫。例如，在與東協具有同等競爭優勢的開發中國家當中，墨西哥正積極整合進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在東亞地區，中國具有強大的資金磁吸效果，對於東協具有國際資金的競逐與排擠壓力；在歐洲方面，尤其是歐洲單一市場的產生以及預期的東擴發展，歐洲資金將不可避免地往中東歐地區新興開發中國家傾斜。特別是歐盟向來是東協第三大國際資金來源者，因此如何繼續鞏固歐洲資金，不至於完全過度流向中東歐新興國家，對於東協將是相當重要的發展策略考量，這也促使東協必須採取更積極的作為來繼續鞏固歐洲國際資金的進駐。因此，透過亞歐會議的形成，制度性提昇亞/歐之間在貿易暨投資的互動，有助於東協此一目標的達成。

註②⑧ 東協最進步之六國已於一九九二年完成AFTA之簽署，不過此一條約卻於二〇〇二年一月一日方才生效。

註②⑨ P. Bowles and B. MacLean, "Understanding Trade Bloc Formation: The Case of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2 (Summer, 1996), p. 327; A. Panagariya, "East Asi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in World Trade," *The World Economy*, Vol. 17, No. 6 (1994), pp. 827~828.

註③① Meeting of ASEAN Heads of Government, 1995, para. 8 of the Declarat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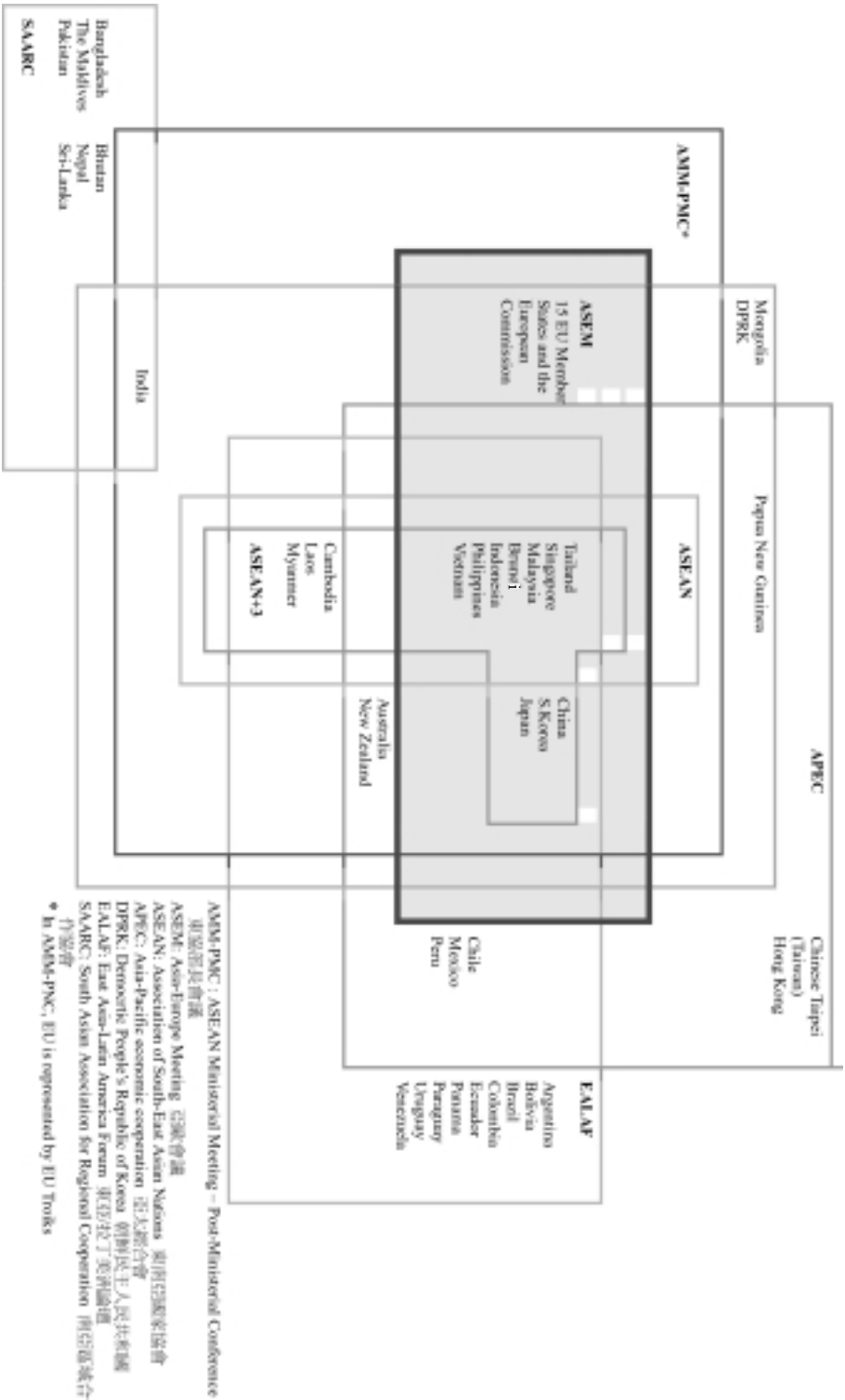
此外，從複合型區域主義的觀點也可以說明，為何東協自一九九〇年代即開始不斷地積極籌組或參與各種區域性組織，以及亞歐會議對於東協的多重意義。東協除了透過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設計，強化其競爭國際資本的實力之外，另外則透過強化其作為東亞唯一區域性組織的重要性，積極塑造其作為代表亞洲區域組織自主性的能量，例如在亞太經合會中，積極組織亞太經濟論壇，一方面抗衡美國勢力，一方面強化亞洲集體對話能力，現在再透過亞歐會議與歐洲國家建立一合作架構，希望爭取區域間對話機制的主導性，並引進歐洲聯盟力量，一方面增加鞏固區域安全的國際勢力，另一方面則是藉此平衡美國在東亞的勢力。這種首先透過強化地區性區域組織（如東協區域論壇以及東協自由貿易區），再以此一區域組織擴大到與其它區域組織對話的策略（如亞太經合會以及亞歐會議），使得原本在國際體系中處於相當邊陲地位的小國，卻能有效地擴大其國際影響力。這也反應一種在全球化之下開發中國家一種新的外交型態，小國為避免在全球化過程中被邊緣化，必須透過區域組織來壯大其國際地位與談判能力。這種東協國家所展現出來的複合型區域主義之策略與特色，也清楚地展現在亞歐會議本身与其它既有區域組織高度複合重疊的特殊性（請參見圖一）。

同時，我們也可以將東協推動亞歐會議的脈絡，放入東協自九〇年代起一連串的回應全球化所作的區域性回應過程來觀察：東協在一九九〇年提議建立東亞經濟小組（EAEG），藉此希望組成一完全以東亞國家為核心的區域組織；一九九二年進行區域內擴大政策以確立區域自主性基礎；一九九三年成立東協區域論壇引進世界強權勢力鞏固區域安全；一九九三年在亞太經合會中組成東亞經濟論壇以強化亞洲集體自主性與對話能力；一九九四年新加坡即積極推動亞歐會議的形成；一九九五年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以提昇在全球化之下國際資本進駐的結構性誘因；一九九六年亞歐會議正式成立，引進歐洲聯盟力量，提升與歐盟區域間關係，確保歐洲資金的繼續鞏固，同時亞歐會議對於東協國家而言，可以說是間接借助引進歐洲國家的力量，形成了長期以來其希望建立卻未能成功的東亞經濟論壇；^①二〇〇二年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框架協議，^②積極與中國市場整合，一方面希望透過與中國市場整合的磁吸效果，強化國際資金的進駐，同時避免國際資金過度向中國傾斜。在此脈絡下，本文認為東協推動亞歐會議並非是一單一事件，而是東協一系列面對全球化挑戰所作的區域性回應政策中的一部份。

註① 東亞經濟論壇的前身為東亞經濟小組（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是在一九九〇年由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在布魯賽爾 GATT 談判失敗後所形成的，這個小組希望結合東亞國家形成一東亞經濟組織，因此成員國邀請包括東協國家、日本、南韓、台灣、香港、中國，明顯地刻意將美國、加拿大、澳洲排除在外。事實上，部份東協國家領導人一直希望組成一完全以東亞國家為核心的區域組織，以形成東亞的集體力量來抗衡美國勢力，因此從一開始，這個東亞經濟小組的提議即被美國以及澳洲所反對，日本反應也相當冷淡，最後這個小組在一九九三年透過東亞經濟論壇的名義，以相當鬆散的形式存在於亞太經合會內。

註② 東協與中國於二〇〇二年十一月簽署「自由貿易框架協議」，將組成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預計於二〇〇四年完成談判，此一包含十七億人口的自由貿易區，預計需費時十年建成。參見：中國時報，民國91年11月5日，版1。

圖一 复合型區域主義下的亞歐高峰會議



資料來源：歐盟官方網站：<<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relations/asem/asem-summits/asem4>>.

伍、歐盟推動亞歐會議的結構性動力： 以區域間主義為典範的對外關係

對於歐洲聯盟而言，透過新區域主義的分析架構，可以理解歐盟自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所發展出的對外關係樣貌及其特質，以及亞歐會議所具有的意義。事實上，歐盟自八〇年代末期起，為回應全球化挑戰，即陸續與許多區域組織建立區域間關係，而這種區域間主義的發展策略也成為歐盟自八〇年代末期所逐漸發展出的一種新的對外關係典範。例如自八〇年代末期歐盟即與東協國家簽訂第一個區域間貿易協定，其它重要的區域間貿易協定及區域間對話機制例子尚包括：一九八七年與南美洲的安地斯協定國家（Andean Pact），^③一九八七年與中美洲國家，一九九〇年與波斯灣合作會議國家（Gulf Co-operation Council），一九九二年與拉丁美洲的南錐共同體，^④一九九四年與南非發展共同體（South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以及一九九五年與其鄰國地中海國家簽訂「歐盟/地中海合作夥伴」協定，^⑤一九九五年設立泛大西洋新議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NTA），作為美國與歐洲之間的經濟談判機制。

歐盟自九〇年代開始即積極與各區域建立區域間協定或區域間對話機制，以取代過去與個別國家雙邊關係的架構，近來更有朝向建立區域間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傾向，^⑥這種相當積極建立區域間關係的外向型以及複合型區域主義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其對外關係的典範。而歐盟在發展這種區域間關係時，也呈現與開發中國家簽訂區域間協定為優先主軸的發展趨向，這也符合南北區域主義的特質；同時，相較其它世界強權或是區域組織（例如美國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截至目前為止，歐洲聯盟也是發展這種區域間關係最全面也最完整的區域組織。

然而，歐盟這種新區域主義的發展模式，在建立全球經貿網絡時，卻獨缺對於東亞的區域間制度，因此亞歐會議也必須置於這樣的脈絡中加以觀察，特別是至九〇年

註③ 安地斯協定國家包括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祕魯以及委瑞內拉。

註④ 南錐共同體（Mercosur, Mercado Commun del Cono Sur）包括四個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巴西、巴拉圭與烏拉圭。

註⑤ 相關資料請參閱歐盟執委會網站：<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relations/>。

註⑥ 例如在一九九五年十月，在既有的區域間貿易協定基礎上，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又提出自由貿易區的提案，而此提案在一九九八年於智利所召開的雙邊國家領導人會議中被加以確認。另外，歐盟與其地中海鄰近國家也於一九九五年簽訂「巴塞隆納宣言」，希望在二〇二〇年之前完成自由貿易區的計劃。

代中期，北美/東亞，歐盟/北美之間已經建立相當制度化的區域間關係，^⑦唯獨歐亞之間欠缺此一類似機制。因此，歐盟意識到這種三角團塊關係不平衡的現象，如何積極建立一亞/歐區域間架構以補足三角關係中最脆弱的一環，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也成為歐盟相當重要的議題。因此，歐洲聯盟透過亞歐會議積極建立與東亞之區域間關係，事實上也是其整體以區域間主義為主軸之對外關係中的一部份。

再從全球化與區域化發展而言，東亞地區在九〇年代中期對於歐盟而言，更有其政策上的特殊性與急迫性。首先自八〇年代末期亞洲經濟奇蹟所展現出來的高度成長，已經改變傳統北美/東亞/歐盟的三角關係。自一九八二年起，北美與東亞的貿易量已經超過歐美之間的貿易量，自一九九二年起歐亞貿易量也首次超過歐美貿易量，東亞地區成為歐盟國家最重要的區域貿易夥伴，^⑧這也迫使歐洲聯盟必須重新調整與東亞關係。另一方面美國柯林頓政府透過 APEC 積極整合亞太地區經貿，特別是一九九五年 APEC 大阪會議確定在二〇二〇年以前完成自由貿易區的決議後，更加深歐洲的不安，擔憂歐洲將逐漸地邊緣化，因此亞太地區快速的經濟整合趨勢，自然也刺激亞歐會議的形成。另外，在一九九三年歐盟在西雅圖會議中欲申請成為 APEC 觀察員身份被拒之後，^⑨歐盟更體認到在亞洲事務上缺乏真正的立足點，也亟思一可能之機制來確保其在亞洲政經事務的介入的舞台以抗衡 APEC。

的確，從地緣經濟觀點來考量，亞歐會議的產生，一方面是歐洲聯盟建構其全球性區域間關係的一部份，同時也是回應於亞太地區透過亞太經合會的快速整合發展現象。因此歐洲聯盟對於亞歐會議的政策設定具有三項特色：第一，歐盟強調亞歐會議必須採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事實上歐盟是希望透過此一原則來監督亞太經合會開放性區域主義的落實，以避免亞太經合會走向壁壘化的發展。第二，歐盟希望透過亞歐會議促進自由化的談判進程，以避免亞太地區對於歐洲國家形成排他性的貿易壁壘，因此歐盟將亞歐會議界定為歐亞雙方關於 WTO 談判的會前會或是後續討論的場域，例如歐亞雙方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中，組成關於貿易及投資的高級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註⑦ 東亞與北美關係，在安全方面主要是透過美國與許多亞洲國家的雙邊軍事安全架構所建立的安全網絡，在經濟方面則是透過亞太經合會作為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機制。而在歐美關係方面，安全上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經濟上則有泛大西洋新議程，作為美國與歐洲的經濟談判區域間機制。

註⑧ Christopher M. Dent,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East A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economics*, Vol. 32,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7), p. 9.

註⑨ Jacques Pelkmans, "A Bond in Search of More Substance: Reflections on the EU's ASEAN Policy," in Chia Siow Yue and Joseph L.H. Tan (eds.), *ASEAN and EU: Forging New Linkages and Strategic Allianc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Paris, 1997), pp. 36~37.

SOMTI)，開始制度性地處理此項議題。^④因此從第一次亞歐會議開始，歐洲聯盟即相當關注於貿易自由化的議題，一方面確認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以確保歐洲不會受到亞洲國家的貿易歧視，同時歐洲也尋求亞洲國家支持，繼續處理在烏拉圭回合中尚未解決的議題，如電訊業、金融服務業自由化問題的談判。第三，從複合型區域主義觀點而言，歐洲聯盟在建構這種區域間關係時，是將其視為一區域政策來設定，因此歐洲聯盟在建構這種區域間機制時，往往將其設定為包含政治暨經濟目的之區域間政策平台，因此相較於亞太經合會純粹以經濟目的為主，亞歐會議從一開始則設定包含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面向議題，其中，歐盟特別強調在亞歐會議中必須討論政治議題，因此亞歐會議從一開始即設有政治性議題的討論，這也是相對於亞太經合會最大不同之處。事實上，歐洲主要強權國家，尤其是法國與英國對於亞洲安全議題長期以來即是相當關注的，而在後冷戰時代，這些歐洲主要國家一方面必須調整在亞洲地區其後殖民時期之角色轉換，另一方面更有現實的武器買賣之商業利益考量，因此希望對於亞洲安全議題上尋求對其有利之空間，因此透過亞歐會議的正式對話，可以提供強化其在亞洲安全角色的機會。

基於以上的分析，本文也試從新區域主義來理解亞歐會議的性質與特色（參見表二）。對於東協國家以及歐盟而言，亞歐會議之所以確立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乃是一種雙邊利益的合致，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東協，主要是希望透過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作為整合進入國際體系的機制，而對於歐洲聯盟而言，開放性區域主義則是作為避免其它區域主義朝向壁壘式區域主義的發展。因此，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具有積極整合進入國際體系，以及兼具防止其它區域組織朝向封閉化的發展，就這一點而言，對於開發中國家以及已開發國家而言，具有共同利益，因此在第一次亞歐會議確立組織原則時，東協以及歐盟即積極將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訂定為最重要的組織原則。另外，透過南/北區域主義的觀點，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是由開發中國家區域組織的東協，以及已開發國家區域組織的歐盟，積極推動亞歐會議的形成。東協希望透過提昇與歐盟的制度性關係，來鞏固歐洲資金，避免過度流向中東歐新興國家，亞歐會議對於歐盟而言，一方面是完備其全球性區域間主義在亞洲地區的建構，另一方面則是避免因亞太經合會的快速發展，使得歐盟在東亞地區逐漸邊緣化。從複合型區域主義觀點，對東協與歐盟而言，皆是其各自複合型區域主義發展的一部份，同時也呈現出亞歐會議兼具政治、經濟、文化三大議題的多元性與特殊性。

註④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SOMTI)，參見 Christopher M. Dent, "The ASEM: Managing the New Framework of the EU'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4 (Winter, 1997-1998), p. 511.

表二 新區域主義與亞歐會議

	新區域主義主要特質	舊區域主義主要特質	東協（開發中國家區域組織）：亞歐會議的原始提議者	歐盟（已開發國家區域組織）：亞歐會議的推動者	亞歐會議的性質與特色
外向型與開放型區域主義	(1)新自由主義：建立全球網絡的外向型區域主義 (2)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對區域外非成員國開放而不封閉 (3)在區域內或跨區域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內向型區域主義	(1)積極整合進入國際體系：開放性區域主義的確立 (2)提升國際競爭力以爭取國際資本的進駐	(1)區域間主義：積極建立與各區域的區域間關係，包括簽訂區域間貿易協定，區域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2)開放性區域主義作為避免其它區域朝向壁壘式區域主義的發展	(1)確立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 (2)作為討論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之會前會 (3)東亞與歐洲之區域間組織
南/北區域主義	(1)國際資本的快速增加與全球化：國際資本大量移往開發中國家 (2)南/北國家進行區域整合 (3)已開發國家區域組織必須與開發中國家進行區域間貿易協定	南/南或北/北區域主義	(1)吸引國際資金：特別是已開發國家的國際資金 (2)設立東協自由貿易區：擔憂國際資金分散 (3)藉由亞歐會議確保歐洲資金，避免過度流向中東歐開發中國家	歐洲聯盟建構此一區域間關係呈現與開發中國家簽訂區域間貿易協定為優先主軸的發展趨向	主要提倡者為東協（開發中國家區域組織）以及歐盟（已開發國家區域組織）
複合式區域主義	(1)重疊複合式參與區域組織 (2)後冷戰多元體系下區域整合動力源自於區域內在自發力量 (3)建構區域組織的多重目的	冷戰二元體系下的霸權式區域主義	(1)經濟目的：避免在全球化競爭中被邊緣化 (2)政治目的：引進歐盟勢力鞏固區域安全，以提升國際地位與集體談判能力	(1)分散國際貿易 (2)保障國際資金安全	(1)亞歐會議對於東協與歐盟而言，皆是其各自複合式區域主義的一部份 (2)亞歐會議的多元目的：經濟、政治、文化三大面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陸、結 論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所興起的新一波區域主義整合運動，有著迥異於過去區域主義發展的動力來源與發展樣貌。新區域主義三項特質（外向型與開放性區域主義、南/北區域主義、複合型區域主義）背後共同的動力皆是全球化：(1)由於全球化之下國際經貿互依性增強，各國一方面必須透過區域整合方式作為建構全球經貿策略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必須建立對外開放性的連結關係，以求積極整合進入國際體系，導致產生一種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核心價值，以簽訂區域內或區域間自由貿易協定為主要型態的外向型區域主義。同時開放性區域主義的基本精神，一方面被主要區域間組織（包括亞太經合會以及亞歐會議）所採納作為推動自由化的基本精神，而另一方面，開放性區域主義的原則也被當作一種防止其他區域朝向壁壘化的主要工具；(2)全球化與過去國際化最大的不同，在於國際資本的大幅增加與國際流動，特別是已開發國家的資本流向開發中國家，促使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進行區域內或跨區域的合作，導致一種以南北國家之間的區域貿易協定為主，以結合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為特色，或是整合國民生產毛額差異甚大的區域整合發展現象，導致南/北區域主義的產生；(3)區域內或跨區域間為了合作或是為加強對外競爭，而各自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使得不同型態的區域主義契合共存，導致複合型區域主義的產生，同時複合型區域主義也反應在全球化之下，形成區域整合的政治經濟多重目的與多重面貌，產生一種各國多元參與或建構區域組織的現象，也加深複合型區域主義的形成。

本文嘗試透過新區域主義的分析架構，來分析東協與歐盟此二區域組織推動亞歐會議的結構性動力，以及亞歐會議的特質。本文認為，既有的亞歐會議相關文獻，未能針對東協國家為亞歐會議形成的最主要推動者此一關鍵事實，提出適當的說明解釋，本文嘗試從新區域主義的研究取向提供另一種可能的解釋面向。本文認為東協推動亞歐會議的形成，必須將其置入東協自九〇年代起，一連串的回應全球化所作的區域性回應方式過程中來觀察，從這樣的一個觀察脈絡而言，若將東協視為一開發中國家回應全球化挑戰的一個範例而言，則又是饒富趣味的問題，而透過新區域主義研究取向似乎可以提供另一種觀察角度。

同時本文也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試圖論證，亞歐會議乃是東協以及歐盟回應全球化挑戰的方式之一，然而兩者的戰略邏輯卻是有所不同。事實上，在全球化的發展下，新區域主義會產生兩個平行發展的現象，一方面是區域整合運動的方興未艾與繼續深化，另一方面則是各區域組織之間積極地進行區域間的貿易協定或是區域間的合作，但是這兩種發展方向，對於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中國家而言，則是依據各自不同的策略思考與目的。對於已開發國家而言，以歐盟為例，區域整合的目的在於拓展區域內貿易，鞏固對外競爭的基礎，而區域間貿易協定之目的在於對外拓展全球貿易網絡，降低其國際資本（特別是投注在開發中國家的國際資本）的風險，以提供其國際商業活動的制度性保障。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以東協為例，建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目的

並不在於擴大區域內貿易，而是基於擔憂國際資本的全球競爭與分散化，因此在以繼續吸引外來國際資本做為其經濟發展的主要策略的考量下，東協透過設立自由貿易區提供給國際資金輸出國一種制度性誘因，以繼續吸引國際資金的進駐。同時透過區域間的合作，積極整合進入國際貿易體系，以便在這一波開發中國家全球資本的競賽中不被邊緣化。另外，開發中國家進行區域化以及區域間合作，往往兼具有政治與經濟的考量，經濟上爭取國際資金的進駐，政治上則是透過區域化鞏固區域實力，再透過區域間的互動擴展國際影響力，展現一種全球化之下開發中國家新的小國外交型態，在這一方面，東協可說是相當成功，亞歐會議也必須置於這樣的脈絡來理解其形成的結構動力。

* * *

(收件：91年11月8日，修正：92年10月31日，接受：92年11月5日)

Structural Motivations fo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ormation of ASEM: A New Regionalism Perspective

Pei-chih Hao

Abstract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is the highest level dialogue and inter-regional forum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since the mid-1990s. In fact, ASEM was formed and initiated by two key actors—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Although many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subject of ASEM, an analysis of the two key actors is lacking.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put forward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regionalism and offe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actors' structural motiv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ree distinct aspects of new regionalism—extroverted and open regionalism, North-South regionalism, and multiple regionalism—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at ASEM is an alternative mechanism for the ASEAN and the EU to react to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Keywords: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New Regionalism; European Union (EU);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參考文獻

- Bajo, Claudia Sanchez (1999),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ercosur: A Case of Inter-region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5, 927-941.
- Bowles, Paul (1997), "ASEAN, 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acific Affairs*, 70:2, 219-234.
- Camroux, David and Christian Lechervy (1996), "Close Encounter of a Third Kind? The Inaugural Asia-Europe Meeting of March 1996," *The Pacific Review*, 9:3, 442-453.
-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994), "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 COM (1994) 427 final.
- Commission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2000), "Perspectives et priorités du processus ASEM (réunion Asie-Europe) pour les dix années à venir," *Document de Travail de la Commission*, Bruxelles, le 18.4.2000, COM(2000) 241 final.
- Dent, Christopher M. (1997), "The ASEM: Managing the New Framework of the EU'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Pacific Affairs*, 70:4, 495-516.
- Dent, Christopher M. (1997),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East A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economics*, 32:1, 7-13.
- Dent, Christopher M. (1999), "The EU-East Asia Economic Relationship: The Persisting Weak Triadic Link?"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4, 371-394.
- Drysdale, Peter (1991), "Open Regionalism: A Key to East Asia's Economic Future," *Pacific Economic Paper*, No. 197.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Goh, Chok Tong (1994), "L'Asie et l'Europe: une nouvelle alliance pour le XXI^e siècle," *Politique Etrangère*, 1099-1106.
- Hettne, Björn,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1999),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Higgott, Richard (1996), "Mondialisation et gouvernance: l'émergence du niveau régional," *Politique Etrangère*, 279-292.
- McMahon, Joseph A. (1998), "ASEAN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 Strengthening the European Union's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3, 233-251.
- Palmer, N. D. (1991),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Panagariya, A. (1994), "East Asi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in World Trade," *The World Economy*, 17:6, 810-828.

- Park, J. (1995), "The New Regionalism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11:1, 11-25.
- Pelkmans, Jacques (1997), "A Bond in Search of More Substance: Reflections on the EU's ASEAN Policy," in Chia Siow Yue and Joseph L.H. Tan (eds.), *ASEAN and EU: Forging New Linkages and Strategic Allianc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Paris, 33-57.
- Sachwald, Frédérique (1997), "La mondialisation comme facteur d'intégration régionale," *Politique Etrangère*, 2, 257-337.
- Serradell, Victor Pou (1996),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 185-210.
- Second Report of the Eminent Persons Group (1994), "Achieving the APEC Vision, Free and Open Trade in the Asia Pacific," APEC.
- Telo, Mario (2001), "Introduction: Globalization,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Mario Telo (ed.),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 Aldershot, U. K.: Ashgate, 4-8.
- United Nations Center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UNCTC) (199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Whalley, J. (1996), "Why Do Countries Seek Regional Trading Agreem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5552.